

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

邵 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关键词：石峁城址，陶器，分期与年代，修建过程

摘要：本文以2014年石峁内城韩家圪旦地点的发掘收获为切入点，结合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五年来积累的丰富资料以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材料，将石峁遗址予以初步分期，并根据各期典型遗存在石峁城址内部的分布规律，探讨了石峁城址三重城垣的修建年代和相互关系，为探讨石峁遗址聚落结构及其与流域内其它石城聚落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KEY WORDS: Shimao stone walled-city, Ceramics, Chronology and age, Constructional proc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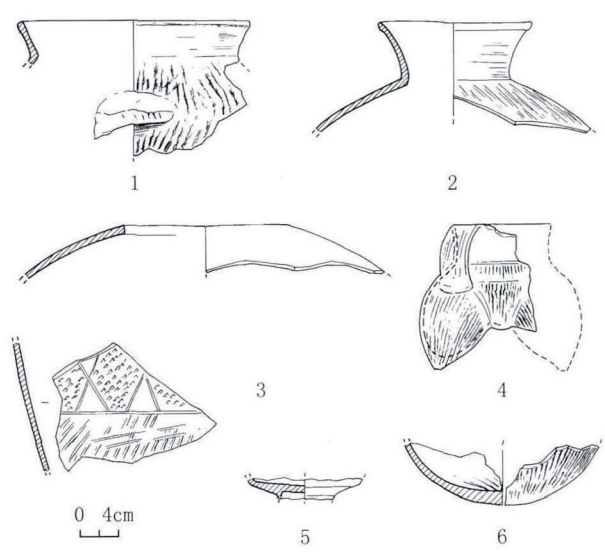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e article synthesizes the late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the Hanjiagedan locus inside the Shimao stone walled-city in 2014 with data accumulated through past five season excavations at Shimao and materials in nearby areas. Based on this rich dataset, the author tries to chronologize the Shimao site and, through mapp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emains of different phases,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al sequences, ages,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layers of the stone walls. This study will lay down a solid foundation with which to analyze the settlement pattern of the Shimao sit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stone walled-settlements within the same valley.

2011年7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成调查队，对石峁遗址周边1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调查表明，龙山时期陶片、灰坑、墓葬遗存与周边基本闭合的多重石砌城墙分布范围上存在着高度的趋同性。结合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龙山石城的考古资料，调查队提出石峁遗址是一处规模超大的龙山时期石城聚落^[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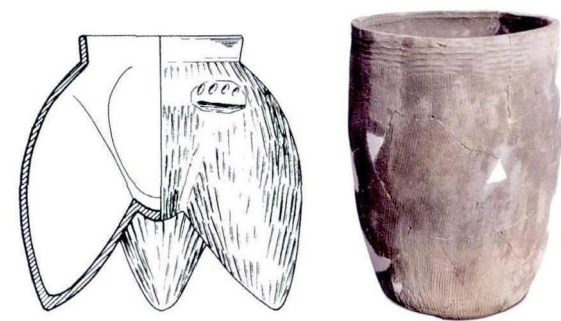
2012年，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考古队先后针对石砌城墙的开展了复查，测量了石墙现存长度、暴露高度和可见宽度等基本数据，发掘了外城东门址、后阳湾、韩家圪旦墓地、樊家庄子祭坛等地点。外城东门址的发掘首次从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上确认了砌城墙系龙山时期遗物，是石峁遗址的重要构成部分，改变了早年关于石峁遗址范围及周边石墙为战国秦长城的认识^[2]。石峁城址是以“皇城台”

为核心，内城环绕皇城台，外城半环绕内城的三重结构。其中“皇城台”是四周以石砌筑层阶状护坡的台城；内城以“皇城台”为中心，沿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外城则依托内城东南部的墙体修筑一道不规则弧形石墙，与内城东南墙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外城区域，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3]。

石峁城址具有三重城垣，当非一日而成。根据测年结果及器物特征，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址的修建年代被确认为不早于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2200年^[4]；废弃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800年。关于皇城台、内外城城垣的修葺过程及各重城墙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值得慎重考虑。本文以韩家圪旦地点居址出土陶器类型分析为依据，结合近五年来的调查、发掘资料来讨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建修过程等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本文的观点或许会随着新材料的不断



图一 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段典型陶器
1. 双鬲 2. 喇叭口罐 3. 敛口瓮
4. 单把鬲 5. 细柄豆 6. 圜底瓮



图二 石螺擦山遗址出土典型陶器

丰富而细化、深入甚至修正，所以目前的认识只能是初步的。

一、韩家圪旦早期居址的年代

发掘表明，韩家圪旦地点先后承担过居址和墓地两种聚落功能。早期为居址，房屋以高低错落的窑洞为主要建筑形式；晚期成为墓地，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石棺墓和偏洞室墓，尤以竖穴土坑墓居多。居址和墓地形成两个具有先后承袭关系的相对独立单元。

居址本身又可分为早、晚两段。居址晚段出土的陶器在外城东门址多有发现，以高领鬲、大口尊、粗柄豆、喇叭口折肩罐等器物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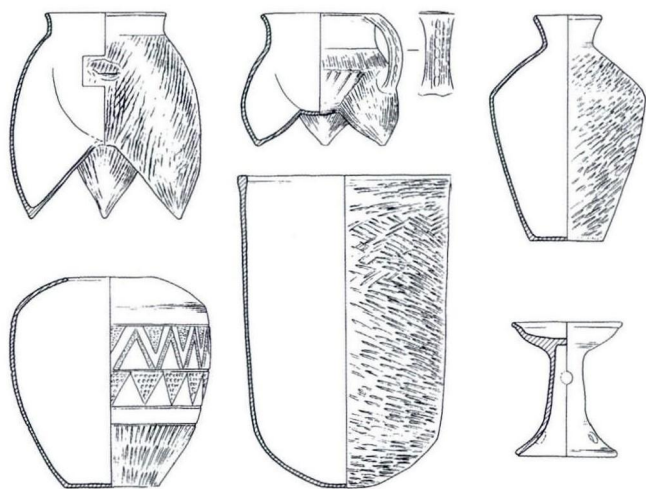
为典型的龙山晚期遗存。

居址早段出土的典型器物数量众多，器形丰富，器物组合关系明确且多次重复出现于不同遗迹单位中。早段典型器形主要有双鬲、单把鬲、喇叭口罐、圜底瓮、敛口瓮、细柄豆等。典型陶器的形态特征如下：双鬲器型较大，矮直领，宽裆下弧或略平，“正装”对称鸡冠状鬲手，大肥足，无实足跟；单把鬲器型较小，中直领，把中宽，腹部外凸明显形成弧棱或直棱，宽裆下弧，三足外撇，无实足跟；喇叭口罐，小喇叭口，肩部圆弧或稍折，下腹斜直或稍外凸，平底较大；圜底瓮，器型厚实，直口方唇，直壁下收，旋钮成圜底；敛口瓮，器型较轻薄，口沿处有对称分布的两个一组的小孔，圆肩，下腹急收，平底，上腹部一般有连续分布的复杂刻划或戳刺纹样；细柄豆，器型较小，豆盘浅、柄细高（图一）。

与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段陶器相似的遗存在陕西还见于佳县石螺擦山（图二）^[5]和榆林寨峁梁^[6]等遗址，以寨峁梁遗址出土材料最为丰富。

寨峁梁遗址位于榆林市榆阳区安崖镇房崖村，与石峁遗址同属秃尾河流域，南距石峁遗址约 20 公里，是一座保存较好、遗存丰富的龙山时代小型石城聚落。常见的陶器组合包括双鬲、单把鬲、喇叭口罐、圜底瓮、敛口瓮、细柄豆等，在多数房址等遗迹单位内重复出现（图三）。这批陶器与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段陶器具有相同特征，且复原陶器较多，弥补了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期典型陶器较于破碎的缺憾，为石峁遗址文化遗存的分期及其与周边同类遗存的对比分析提供了比照材料。从区域格局来看，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自公元前 2500 以来考古学文化面貌高度一致，这一认识目前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7]。近年来晋北地区龙山时代石城聚落调查和发掘的最新成果^[8]，更加深了上述三个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联系。

与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期遗存年代相当的是



图三 寨砦梁遗址出土典型陶器组合

山西汾阳杏花村(图四)^[9]、定襄青石^[10]、内蒙古岱海“老虎山文化”诸遗址(图五)^[11]、准格尔旗洪水沟^[12]、清水河县城嘴子^[13]等遗址。以相对年代来看,这类陶器组合属各地龙山时代早期遗存。就绝对年代而言,陕西北部^[14]和山西中北部目前尚无测年数据,内蒙古中南部的测年数据大体将“老虎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定在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2300年。依此,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段年代亦当在此。而据现有资料,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段为代表的遗存在石峁城内年代较早,当可代表石峁城建的较早年段,为下文探讨石峁城址的营建过程提供了时间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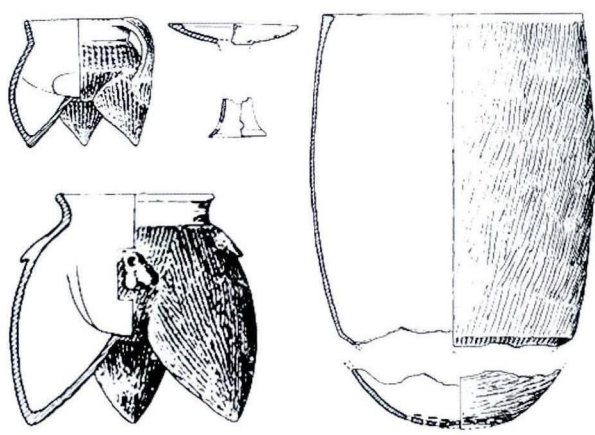
二、石峁城址陶器遗存的分期

双鬲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极具断代意义的典型器物,双鬲的型制存在着裆部由“宽”到“瘤”再到“尖角”的发展演变过程^[15],领部随之变化的趋势为由矮变高,实足跟从无到有再不断加高,这一演变规律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矮领宽裆无实足跟鬲是目前所认识到的“双鬲文化遗存”最早阶段的典型特征。石峁遗址韩家圪旦等地点的发掘资料同样支持上述演变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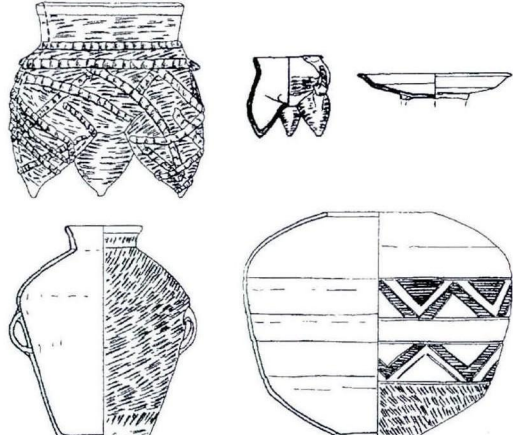
石峁遗址发现的双鬲文化遗存典型器物 and 层位关系主要有: 1) 2012年内城圆圪堵地点白灰面房址出土矮领宽裆双鬲和喇叭口圆肩罐; 2) 2012年内城后阳湾地点发现矮领瘤裆无实跟双鬲打破矮领宽弧裆无实跟双鬲的层位关系^[16]; 3) 2013年后阳湾地点发现花边高领尖角裆实跟双鬲叠压高领尖角裆无实跟双鬲的层位关系; 4) 2012至2013年外城东门址出土高领尖角裆高实跟双鬲叠压高领尖角裆实跟双鬲的层位关系; 5) 2014年内城韩家圪旦地点出土高领尖角裆实跟双鬲叠压矮领宽裆无实跟双鬲的层位关系。

依据这些层位关系和典型陶器标本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将石峁城址内部现知遗存分作从早到晚的三组: A组以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期、后阳湾地点W3、圆圪堵地点房址和麻黄梁地点为代表(图六); B组以后阳湾地点2012W1、呼家洼地点2012F3、外城东门址早期、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晚期为代表(图七); C组以后阳湾地点2013晚期层位和外城东门址晚期为代表(图八)。

此三组陶器组合除双鬲演变规律明显外,共存的其它器形也有明确的变化趋势或早晚关系。A组中常见的直口圜底瓮、敛口刻划纹瓮不见于B组和C; 单把鬲由A组的中宽把宽弧裆演变为B组的宽把尖角裆; 喇叭口罐由A组的小口圆肩(或轻折肩)到B组的大口折肩再到C组的重折肩加亚腰; 豆由A组的小盘细柄到B组的柄稍粗再到C组大盘粗柄; 大口尊在A组似折腹盆,到B组腹加深及至C组大敞口下出现折棱; 三足瓮不见于A组,在B组出现但保持直口筒腹状,应是A组直口圜底瓮直接演变而来的,及至C组,体型胖大,腹外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蛋形三足瓮”; 另外,敛口甗和直口甗在A组的出现并不明显,到B组明确兴起; 管流盃则有可能是在B组出现并兴盛于C组的。上述不同组的陶器分别有其自身的遗迹单位作支撑,当可代表当下石峁城址内



图四 杏花遗址出土典型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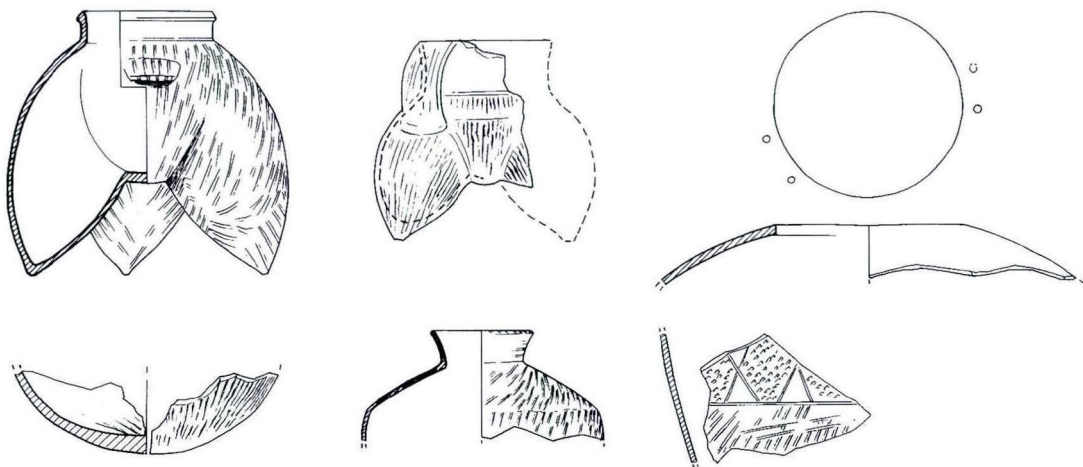


图五 老虎山文化典型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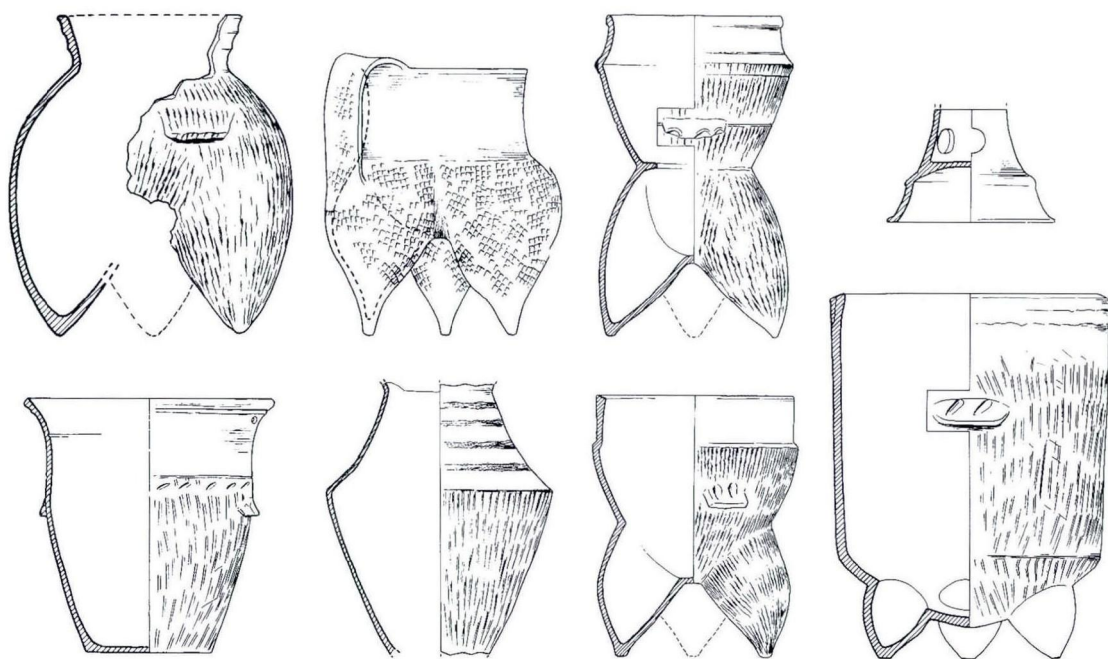
部不同阶段的考古学遗存，本文依其层位关系和器形变化规律暂且将 A、B、C 三组陶器代表的石峁遗存称为 A 段、B 段和 C 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弧裆双鬲和瘤裆双鬲存在先后关系，但是否能代表同一文化不同阶段的考古学遗存，尚且存疑。

石峁遗存 A、B、C 三段的分期并不乏支持材料。双鬲鬲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就可窥一斑。以双鬲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目前虽然尚无统一的命名如陕西北部被称为寨峁文化^[17]、新华文化^[18]；内蒙古中南部称为大口二期文化^[19]、老虎山文化^[20]、永兴店文化^[21]、朱开沟文化^[22]；山西中北部为杏花文化^[23]。这些考古学文化都是以当年的“典型遗址”命名的，对双鬲鬲考古学遗存的研究起到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些典型遗址均未能包含双鬲鬲发展的全部阶段，甚至有些遗址中的双鬲鬲遗存并不丰富。神木寨峁遗址有石峁 A 段和 B 段，但无 C 段；神木新华主要是石峁 B、C 两段，不见 A 段；准格尔旗大口和永兴店遗址较为单纯，分别为石峁 C 段和 A 段；朱开沟遗址则是包含了石峁 B、C 两段和一批商代遗存，年代跨度大、内涵更为复杂；凉城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诸遗址较单纯，仅公布了一件双鬲鬲，大量出现的是单把鬲，因此将老虎山文化的陶器认定为“以双鬲鬲最为典型”似乎显得牵强^[24]；汾阳杏花村遗址发现的双鬲鬲遗存以石峁 A、B 两段为主，若结合忻州游邀遗址石峁 C 段的双鬲鬲遗存分析，似当可以代表山西中北部的双鬲鬲考古学文化。



图六 石峁遗址 A 组（段）陶器



图七 石峁遗址B组(段)陶器

以上分析表明,以双螯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在河套地区主要经历了和石峁遗址类似的三个发展阶段。

前文已述,石峁A段遗存(即韩家圪旦居址早段)的绝对年代应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参照石峁外城东门址晚期房址2012F6碳十四测年的数据(公元前1940至公元前1780)及神木新华测年晚期数据(公元前2150至公元前1900年),石峁C段遗存的绝对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石峁B段遗存目前虽无测年数据,但辅之以新华、朱开沟等遗址同类器形对比和断代,推定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

三、石峁城址龙山遗存分布及其修建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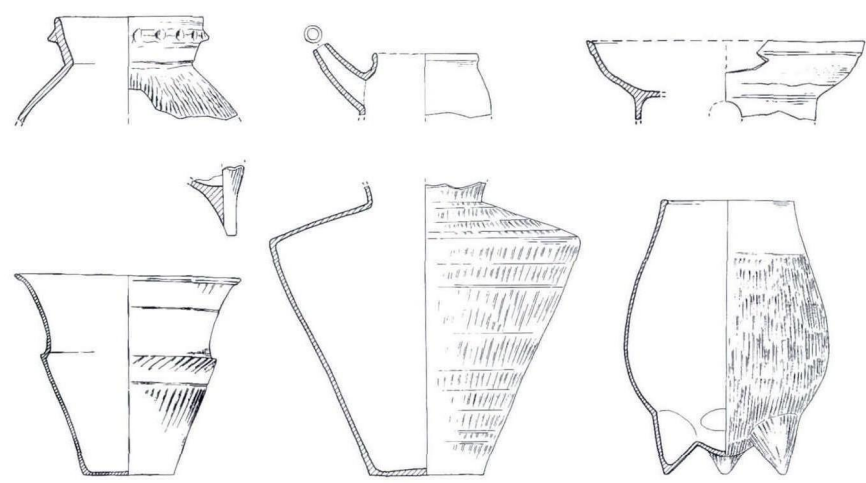
自2011年石峁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开展以来,我们特别注重石峁城址内部采集陶片的分区收集。2012至2014年度发掘间隙调查的采集标本均以小地名为独立地点分别收集。2015年石峁考古队还开展了石峁城址内部专门性考古调查,以自然沟壑为界,将石峁城址划分为16个区域,每个山峁都是一个独立地点,以小

地名命名,采集陶片按地点收集整理^[25]。除采集地表典型陶片外,还采用铲刮剖面、清理盗洞等方式深入了解各地点遗迹单位的年代、性质和相互关系。截至目前,已完成半数地点的野外调查工作。上述调查工作获得了一批典型陶片标本。结合内城后阳湾、呼家洼地点^[26]及韩家圪旦地点发掘资料,可将不同期段的遗存分布范围及其与城墙的关系勾勒如下:

1. A段遗存主要发现于皇城台和内城后阳湾、韩家圪旦、圆圪堵、麻黄梁等地点,外城诸地点几无发现,外城东门址出土陶片中亦未发现。典型陶器或陶片标本有:矮领宽裆无实跟双螯鬲、单把宽裆鬲、喇叭口圆肩罐、直口圜底瓮、敛口刻划纹瓮。

2. B、C两段遗存普遍发现于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且两段遗存重叠存在的现象较为明显。内城后阳湾、呼家洼、对面梁、夜蝙蝠榻等地点,外城坟峁、雷家塬等地点及外城东门址都有发现。典型陶器或陶片标本有:高领尖角裆实根双螯鬲、单宽把尖角裆鬲、喇叭口折肩罐、三足瓮、直口甗、敛口甗、管流盂等。

虽然目前还无法像外城东门址的发掘一样,



图八 石峁遗址C组（段）陶器

将内城城墙和皇城台城墙与石峁城内发现的各段考古学遗存直接对应，但利用不同时期陶片分布情况来探讨石峁城址的修建过程不失为现下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上述不同期段典型陶片在石峁城址内部的分布状况大致可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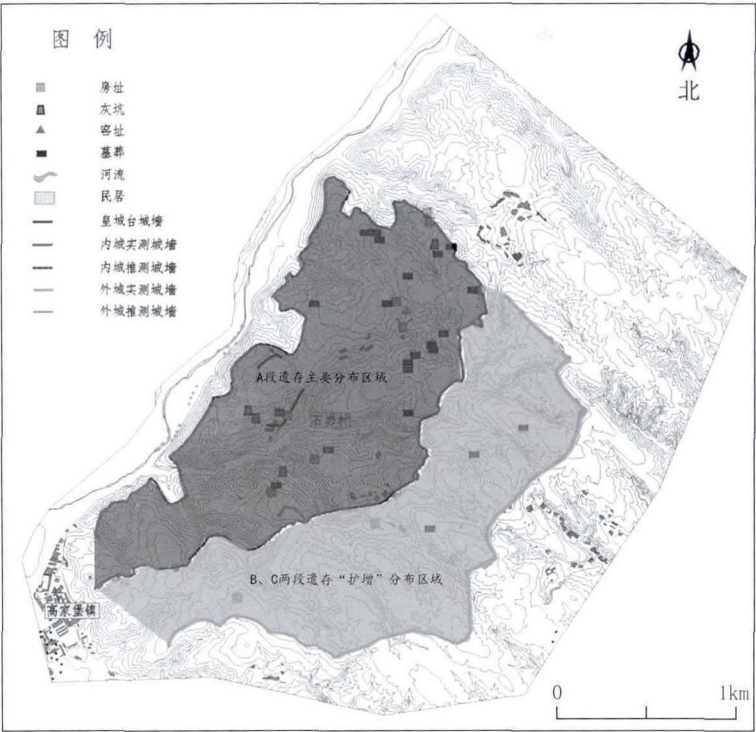
A 段，即公元前 2300 年左右，石峁遗址的范围可能主要在皇城台和内城部分区域(图九，深阴影区域)。难有证据；外城城墙系以内城东部墙体为依托，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而与外城城墙相比，内城城墙上无成系统分布的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发现的几处城门也不见像外城东门址那样对称分布的高大墩台。简言之：石峁城墙存在着外城城墙“叠压”内城城墙的“层位关系”，而内城城墙较为“简朴”的设计理念似乎也暗示着其修建年代当早于外城城墙。截止目前，依外城东门址测年数据推断，石峁外城城墙的修建年代可能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故此本文推断内城城垣的修筑可能要早于公元前 2100 年，皇城台四周城垣是否更早，还需资料的逐步积累。

B 段，即公元前 2100 年前后，

石峁先民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皇城台和内城，已扩展至外城区域内(图九，浅阴影区域)，并明确修建了半环绕内城的外城城墙及系统分布的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在修建外城东门址时，还设计了土石结合的高大墩台。

C 段，即公元前 1800 年左右，该段遗存在整个石峁城址范围内

均有发现，与 B 段遗存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图九，浅阴影区域)，外城东门址及其周边的城墙、马面、角台等建筑局部塌毁后重新修葺，甚至还在城墙外侧利用城墙折角修建石砌墙体的地面式房址，或掏挖墩台、角台等建筑的夯土内芯修建窑洞，外城的防御功能似乎逐步式微。虽然目前难以了解皇城台和内城在该阶段的具体情况，但外城东门址及其周边城防设施的发



图九 石峁城址 A、B、C 两段扩增典型遗存分布示意图

掘材料似乎可以说明,石峁城址在公元前 1800 年前后进入了“衰败期”。

榆林地区诸黄河一级支流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主要分布区域,自北向南依次有黄甫川、清水川、孤山川、石马川、窟野河、秃尾河、佳芦河、无定河等。本文讨论的石峁、寨梁遗址位于秃尾河流域,已经发掘并见诸报道的石擦擦山遗址位于佳芦河流域,金山寨等石城聚落均位于无定河流域^[27]。随着石峁遗址周边石城聚落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中大型石城聚落具有两重或三重结构的现象越来越多,如佳芦河流域的石擦擦山遗址;秃尾河流域的桃柳沟、薛家会遗址;窟野河流域的神木寨梁遗址;石马川流域的寨山遗址等。这些中大型石城应与石峁城址的修建一样,内外城垣的修葺可能多存在先后关系,并且这种年代差异已经具备了分期意义。

- [1] 1958 年,陕西省文物普查工作发现了“石峁山遗址”(即今石峁遗址)。调查者认为这些城墙有“三套结构”,其中以位于石峁大队皇城台高地的“头套城”最为清晰。这是关于石峁遗址石城结构最早的认识,惜未引起重视。
- [2] 戴应新.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J]. 故宫博物院月刊(台北),1993(总第 125). “遗址西部被一支沟切割为二,战国秦长城顺着山梁自东徂西经遗址西南部而过”。
-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J]. 考古,2013(7).
- [4] 测年标本为修建北墩台时使用的红木,树干粗、树龄长,所以外城东门址修筑的年代应晚于该测年数据,又据南墩台红木测年数据(公元前 2140 至公元前 1960 年),辅以典型陶片,我们推定石峁外城东门的修建年代约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
- [5] a. 张天恩,丁岩. 陕西佳县石擦擦山龙山时代城址[C]//2003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b. 张天恩. 石擦擦山遗址[C]//陕西文物古迹大观(三). 北京:三秦出版社,2006. c. 张天恩,丁岩. 石擦擦山龙山古城及相关问题浅论[J]. 考古与文物,2016(4).
- [6] a.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14 至 2015 年发掘资料. b. 孙周勇,邵晶等. 陕西榆林寨梁梁山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N]. 中国文物报,2015-11-6.

- [7] a. 韩建业. 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b. 孙周勇. 公元 3000BC ~ 1800BC 北方区域政体的形成过程考察[C]//古代文明. 待刊.
- [8] 张光辉,海金乐,王晓毅. 山西兴县碧村发现龙山石城及大型石砌房址[N]. 中国文物报,2015-8-28(8).
- [9]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晋中考古[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 忻阜高速公路考古发掘报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1] 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C]//岱海考古(一).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b. 韩建业. 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1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
- [1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14] 据中国科技大学测年,寨梁梁遗存年代可早至公元前 2300 年。
- [15] a. 张忠培. 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釜手陶鬲[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4). b. 《忻州游邀考古》结语部分. 忻州考古队. 忻州游邀考古[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16] 陕西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J]. 考古,2015(5).
- [17] 吕智荣. 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及晋北地区寨梁文化[C]//史前研究.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 [18] 孙周勇. 新华文化述论[J]. 考古与文物,2005(3).
- [19] 吉发习,马耀圻. 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J]. 考古,1979(4).
- [20] 韩建业. 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J]. 中原文物,2007(1).
- [21] 魏坚. 试论永兴店文化[J]. 文物,2000(9).
- [22] 田广金,韩建业. 朱开沟文化研究[C]//考古学研究(五).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23] 张忠培. 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釜手陶鬲[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4).
- [24] 韩建业. 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J]. 中原文物,2007(1).
- [25] a. 孙周勇,邵晶. 石峁遗址:2015 年考古纪事[N]. 中国文物报,2015-10-9(5). b. 孙周勇,邵晶. 石峁是什么城[N]. 光明日报,2015-10-12(16).
- [26] 同[16].
- [27] 王炜林,马明志. 陕北新石器时代石城聚落的发现与初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6(总第 11).

(责任编辑 杨岐黄)